

離散的親密關係

——蘇偉貞眷村小說中的感官書寫^{*}

馮品佳

交通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
中研院歐美所合聘研究員

摘要

台灣眷村的出現是特定歷史時空的產物，而書寫眷村也需要具有特殊眷村記憶的感官表達，以傳達此一特殊時空記憶的幽微情動，也就是一種特殊的離散親密關係。本篇論文試圖跳脫政治意識形態的閱讀模式，透過感官研究的理論，探討蘇偉貞的兩部長篇小說《有緣千里》（1984）以及《離開同方》（1990）是如何透過感官書寫建構此種離散親密關係。

關鍵詞：眷村小說、蘇偉貞、離散親密關係、感官書寫、《有緣千里》、
《離開同方》

* 本文曾於「2011成大文學家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後修正為本文，感謝評論人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

Diasporic Intimacy:

Writing the Senses in Su Wei-chen's Novels of the Military Dependents' Quarters

Feng Pin-Chi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aiwan's military dependents' quarters (*juancun*) were constructed at a particular historic juncture when massive migrations were taking place. The coming together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from China following their relocations to various parts of Taiwan created diasporic conditions that begged for literary expression.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to represent the affective memory and the specific chronotope of these quarters, which are, today, fast disappearing, Taiwanese writers often resort to writing about the everyday lives and sensory encounters of the inhabitants, which creates a special kind of diasporic intimacy. After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scholarship on writings about military dependents' quarters and theories of the senses, I analyze the ways in which Taiwanese author Su Wei-chen constructs such diasporic intimacy through focusing on sensory experiences--especially those of the auditory and olfactory senses--in her novels *Coming Together* (1984) and *Farewell Tung-fong* (1990).

Keywords: Novels of the Military Dependents' Quarters, Su Wei-chen, Diasporic Intimacy, Writing the Senses, *Coming Together*, *Farewell Tung-fong*

離散的親密關係

——蘇偉貞眷村小說中的感官書寫

一、前言

我記憶中家園的圍籬是「扶桑花」。扶桑花是典型的熱帶花卉，也是台灣的公園或鄉間常見的圍籬植物，不但在緊密接觸的眷村中區隔出「家」的空間界限，也為眷村記憶抹上一筆絢麗。

張翰璧，〈「一二三、到台灣」：扶桑花與家園想像〉¹

小黃老師家隔著條小巷，院裡有棵參天巨玉蘭，季節雨日子裡，香氣陣陣襲來，你一輩子都愛這類喬木花樹，嗅聞著不僅像回到家，根本就是老家。

蘇偉貞，《租書店的女兒》²

所以是時差嗎？青年離家再回航，時差特區產生了……說不定根本沒什麼時差特區，你只是堵在重新構造家生活的關卡上，被熟悉又陌生的人事時地物擾亂了。

蘇偉貞，《租書店的女兒》³

二十世紀的中國不缺離散的故事……。我所指的離散不只是家國的破碎，此身的飄零——那仍然是國家「大敘述」的一部分。離散更關乎一種文化想像的解體，一種日常生活細節的違逆。而最刻骨銘心的離散，

1 張翰璧，〈「一二三、到台灣」：扶桑花與家園想像〉，《扶桑花與家園想像》（台北：群學出版社，2011.08），頁ix。

2 蘇偉貞，《租書店的女兒》（台北：印刻出版社，2010.04），頁45。

3 同註2，頁53。

來自個人記憶與遺忘的糾纏散落，還有一切終歸徒然的恐懼。

王德威，〈序二：老去空餘渡海心〉⁴

同樣是回憶眷村，張翰璧的家園想像緊扣著扶桑花的圍籬；蘇偉貞則是愛戀著玉蘭花濃郁的香氣；而筆者的眷村記憶裡，總浮現淡淡幽香的七里香。或許是因為我們談論的眷村不同，蘇偉貞說的是台南影劇三村、筆者回憶的則是台北的光復東村與空南二村，以至於代表性的花草樹木也不盡相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地方都曾經是一群眷村兒女出生、成長的家，而這些感官性的記憶都代表著眷村人與眷村之間的親密關係。同時，眷村也是正在消失中的社群聚落。⁵在離散情境中成形的眷村，無疑也正在消逝之中（disappearing），也因而使得記憶眷村刻不容緩，在眷村「原住民」的心靈腦海各自以不同的形式存留、展現。筆者認為因為眷村的消逝所造成的改變，衍生出特殊而不同於日常生活時間的時間感，也就是蘇偉貞經常提及的「時差」，⁶也因而產生了特別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⁷在諸多文化生產品中，文學作品則往往是再現情感結構的最佳載具。因為時間向度的頻率失調，因此在書寫眷村時，作家會用最基本的感官來定義周遭的環境，建構出具有文化獨特性的情感結構。台灣眷村的出現是特定歷史時空的產物，而書寫眷村也需要具有特殊眷村記憶的感官表達，以傳達此一特殊時空記憶的幽微情動（affect），也就是一種特殊的離散親密關係（diasporic intimacy）。本篇論文試圖跳脫政治意識形態的閱讀模式，透過感官研究的理論，探討蘇偉貞的兩部長篇小說《有緣千里》（1984）以及《離開同方》（1990）是如何透過感官書寫建構此種離散的親密關係。

4 王德威，〈序二：老去空餘渡海心〉，齊邦媛、王德威主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03），頁10。

5 如張翰璧所言，隨著時間流轉，扶桑花籬被磚牆取代，最後房子也不見了，「這就是我記憶中的『家』：原本日漸成形，轉眼間卻整個消逝！……我終於知道，時間，看得到」。同註1，頁x。

6 同註2，頁53。

7 英國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避談冠冕堂皇的「世界觀」或「意識形態」，而選擇以情感來討論時代變異，選擇以幽微情動的元素（affective elements）來討論時代變異，以此強調某些事物在我們親身經歷或感受之後產生的意義與價值，以及這些意義與價值彼此之間的關係。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P, 1977), p.132。

二、眷村與其文學再現

台灣的眷村始源於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台所造成的離散情境。誠如張茂桂所言，眷村的產生其後至少有兩種動力，一方面是隨同國民黨政府遷徙至台灣的軍人需要在島上重建家園；另一方面則是凝聚政治力量，為當時的統治者「光復神州」的目的儲備軍力：

「眷村」其實是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產物。民國三十八、九年經過連年的戰亂流離後，逃難到台灣的「外省人」需要歇息、重整。在個人生活的世界裡面，原來已經成家的，分離的親人要設法克服重重兵險團圓，還沒成家的，也要想辦法在台灣找一個老婆，生一堆孩子，過「正常人」的生活，而住所更一定要安定，國家在這個關頭提供了立即的「克難」式的「臨時」幫助，從而開啟了台灣的眷村歷史；而在另外一方面，國家也要重整，反攻大陸是神聖的使命，所以，軍人必須帶頭犧牲，靠「領袖、主義思想」的教育，原來的「戰敗者」得以重新凝聚團結，眷村變成為安定軍心、培養戰力的後勤部門。⁸

超過一甲子以來，雖然「反攻大陸」的期望早已幻滅，但是以「外省人」為主的聚落卻在全台落地生根，真正成為許多人生長的家園。然而，也如同張茂桂所言，眷村在台灣身分認同政治的論述中，屢屢被貼上各種標籤，或是被當成政治資源操弄，因此，「在反覆的政治敘述中，『眷村』變成一種神秘的符碼，一種特殊的政治類別，一種同質化的刻板印象」。⁹推論眷村文學的創作動機，筆者以為除了感性的記憶之外，也或多或少是為了引領村子以外的人走入眷村，為「竹籬笆」的刻板印象除魅。

作為台灣當代文學重要的次文類，眷村文學在台灣文學發展歷程中自有其特殊的地位。例如梅家玲將1950年代出自外省作家之手的反共小說與1980年代

8 張茂桂，〈導讀：生在竹籬笆裡——從隔閡到發芽生根〉，楊放採訪整理，《落地生根——眷村人物與經驗》（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6.04），頁10。

9 同註8，頁9。

以後眷村第二代書寫的眷村小說共同視為「構成台灣文學主體、體現台灣文學異質多元性格的重要成分」，以之切入性別與家國的兩大議題。¹⁰就眷村文學的特點而言，吳忻怡以社會學的觀點探討眷村文學時所做出的歸納頗為精確；其特點包括多為個人成長記錄的成長小說，是一種族群的集體記憶，書寫的重點在於由眷村探向大社會，記錄的是消失中的社群與保存下來的記憶。¹¹劉俊則提出眷村文學的創作者以眷村第二代為主的看法，因為第一代的軍中作家往往將「文學目光引向了『眷村』之外」，僅只當眷村是棲身之所，鮮少以之為創作的素材；然而對於眷村第二代而言，「他們生于斯長于斯，『眷村』是他們青少年时期的主要活動場所，在『眷村』中經歷、感受和體驗到的一切，已成為他們人生經驗、情感內涵的最重要部分，深深地烙印在他們的思想、行為中……成為他們創作的一個來源與動力」。¹²當前幾位知名的眷村作家如蘇偉貞、朱天心、張啟疆、張大春等人皆屬此範疇。

在眷村第二代作家中，蘇偉貞更可謂眷村文學的代表性人物。蘇偉貞不但透過小說與散文創作探討眷村的歷史與文化意義，在她覺得眷村的離散空間似乎即將失落之際，也經由編纂眷村小說選集來誌記因為時空變化而逐漸消失／消逝的眷村空間，表達她對眷村最終極的肯定：「只要是眷村的就好」。¹³在蘇偉貞的眷村書寫中，這份對於眷村的戀戀深情在字裡行間躍然欲出；而在留戀回顧的基調中，也可以察覺蘇偉貞是如何刻意記錄在流離變動中眷村的成形、解散與轉型。

對於蘇偉貞的眷村書寫，筆者認為趙慶華的〈相聚、離開、沉默、流浪——閱讀蘇偉貞的「眷村四部曲」〉是目前最具深度的論文。趙文將《有緣千里》、《離開同方》、《沉默之島》以及《時光隊伍》視為蘇偉貞以眷村第二代身分所撰寫的「眷村四部曲」，認為這幾部文本中「流露出強烈的『空

10 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台灣小說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10），頁8。

11 吳忻怡，〈昨日的喧嘩：眷村文學與眷村〉，張翰璧主編，《扶桑花與家國想像》，頁11-21。

12 劉俊，〈從《有緣千里》到《離開同方》——論蘇偉貞的眷村小說〉，《暨南學報》29卷4期（2007.07），頁83。

13 蘇偉貞，〈序：眷村的盡頭〉，蘇偉貞主編，《台灣眷村小說選》（台北：二魚文化出版社，2004.02），頁13。

間感』」。¹⁴ 趙慶華在討論《有緣千里》時，使用人文地理學者西蒙（David Seamon）「身體芭蕾」的理論說明致遠新村中的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時空慣性（time-space routine）如何成形、以及時空慣性與特殊地域如何結合成為具有地方感的「地方芭蕾」（place-ballet）（〈相聚、離開、沉默、流浪〉，頁151）。這個理論極為適切地詮釋了剛移居台灣的村民們如何經由建立日常生活的內部節奏產生在地的歸屬感，而論文中討論日常生活細節的部分也是趙文最成功之處。在文本分析之外，趙慶華也指出眷村的建立其實有隱藏的「『隱性控管』的企圖」，而眷村內各種設施的完備，也「使得座落於台灣土地的眷村卻孤立自絕於台灣之外，成為一個封閉的『孤島』」（〈相聚、離開、沉默、流浪〉，頁147）。¹⁵ 趙文的結論認為蘇偉貞的眷村四部曲反映出國家機器與黨國機制操控力量之強大，致使眷村的地方意識與解嚴後的台灣本土意識難以扣合，使得眷村居民在眷村拆除等危機時刻對於現實不滿，「從而徹底解構了台灣土地與認同的意義，甚至選擇以流浪的姿態渡過餘生」（〈相聚、離開、沉默、流浪〉，頁187）。筆者則以為此一結論似乎過於著重眷村的疏離性，企圖描述眷村人民在「反攻復國」的大論述之下產生某種政治上的精神性「水土不服」，對於生於台灣、長於台灣的眷村第二代而言，這是相當反諷的看法，而這樣的論點也可能陷入某種政治過度決定的危險。

誠然，眷村的確是一個因應政治結果而生的特殊空間，由於眷村第一代經常心繫中國大陸，也使得這個生存空間存在「介乎其中」（in-between）的閹域性（liminality）。再加上1970年代末期以來，眷村改建的計畫持續推行，陸續將原先多為矮小平房的聚落轉變為現代化的高樓大廈社區，又使得這個閹域空間（liminal space）成為消失／消逝中的空間。筆者認為蘇偉貞書寫眷村

14 趙慶華，〈相聚、離開、沉默、流浪——閱讀蘇偉貞的「眷村四部曲」〉，《台灣文學研究》1卷1期（2007.04），頁145。後文提及直接於文末括號說明出處。

15 這個「孤島」的意象在海峽彼岸的研究中也獲得呼應。在以蘇偉貞的眷村書寫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論文中，劉俊所歸納出來的眷村特點，除了具有「軍隊背景」，因為聚集了來自中國各地的軍人與軍眷，也因此具有「『微型大陸』的性質」；在某種意義上眷村可謂「台灣社會的『大陸孤島』」，而這種「封閉性與島嶼意象」，恰與「蘇偉貞的人生態度和對人間世的總體看法有著某種同構性」。而且在這個島中之島的眷村空間中，除了封閉性、異質性之外，還有「離鄉性」，因此蘇偉貞的眷村小說中也處處可見「『離鄉者』的身影」。同註12，頁86。

的主要創作動機，就是為了替即將消失的事物留下軌跡，充分展現梅家玲所謂的眷村書寫中「『我寫，故我在』的書寫政治」，¹⁶尤其是企圖記錄從日常生活中所抽離出來的感知痕跡，藉由書寫的行動重組文本空間中的時間領域（chronosphere）。

齊邦媛在討論眷村二代的文學創作時也指出，雖然這一群作者對於父母所辭別的家鄉沒有太大的情感，「倒是面對即將拆遷的眷村和村口被砍的大樹時，錯綜複雜的童年記憶令他們惆悵徬徨。這是軍人族群的第二度辭鄉」。¹⁷也就是在眷村因為外在時空條件而成為消逝中的空間之際，第二代的眷村兒女與父母長輩共同經歷了一次離散的經驗，也成為齊邦媛所謂之鄉愁的繼承者。似這般在半個世紀裡重複發生的離散經驗，正如王德威所言，代表著一種特殊「文化想像的解體，一種日常生活細節的違逆」，更帶有著「一切終歸徒然的恐懼」。¹⁸如同梅家玲所指出，「時間流轉，空間位移，拆遷改建頻頻」，也使得眷村人不僅必須面對「撫今追昔後的恨別傷逝，更是對『家國』觀念的一再重新定義」。¹⁹

由於眷村成形的離散背景與台灣島內的政治情境，眷村文學中的認同問題自然會受到關注。²⁰某種程度上眷村可謂立基於特殊的時間與空間的介面，具有傅柯式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特性。然而，筆者並不認為眷村的空間是全然封閉的孤島，而是帶有相當程度的穿透性，以不同的形式與眷村之外的世

16 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台灣小說論》，頁180。

17 齊邦媛，〈眷村文學——鄉愁的繼承與捨棄〉，《霧漸漸散的時候》（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10），頁154。

18 王德威，〈序二：老去空餘渡海心〉，齊邦媛、王德威主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頁10。

19 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台灣小說論》，頁164。

20 例如法籍的柯雅文（Sabrina Corius）就以蘇偉貞與張啟疆眷村小說中的認同困境與鄉愁意識為碩士論文之主題。她的結論是做為形塑個人的地方，眷村「導致外省第二代的鄉愁……外省第二代是對眷村存有血緣鄉愁而眷村拆除造成了文化鄉愁以及身分認同兩難」。而在時間的流變之中，外省人第二代的認同出現了雙重性：「簡而言之，中國大陸、台灣、眷村，三個不同地方的記憶載體造成兩代的屬性兩難，從懷念故鄉、幻想故鄉、異鄉、同鄉致使雙屬性認同的可能性」。柯雅文，〈眷村文學之認同困境與鄉愁意識——以蘇偉貞與張啟疆作品為主〉（台中：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頁141及頁149。

界互動，《離開同方》中不時出現的戲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²¹ 在飄泊離散的歷史時空中成形的眷村，其實以各種不同方式在建構村子內外以及個人與環境的親緣關係（affiliation）與血緣關係（filiation）。《有緣千里》中寶島姑娘寶珠嫁給來自四川的秦世安，生下至真、至善、至美三個「番薯芋仔」的後代就是最具象徵性的血緣重組。眷村人並不是生活在孤島上，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與台灣這塊土地的連結。想要真正了解眷村，與其一再執著於政治化的解讀，倒不如跳脫政治的大論述，從柴米油鹽、兒女情事的小敘事與日常生活中的感官經驗，來了解眷村作為生存環境（habitat）的意義，以及在眷村空間內的離散親密性。

俄裔藝術史學者柏音（Svetlana Boym）以離散親密關係為題探討俄裔移民的居家裝飾以及藝術作品，在她為離散親密關係所追溯的文化系譜中，柏音認為現代的離散親密性始源於「都會中既是疏離與又具有啟發性的經驗」以及「城市漫遊者與周遭生活既離又合的雙重意識」，不論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或是齊默爾（Georg Simmel）的城市理論都可以真確描繪移民在放逐情境中的經驗。²² 她提出的結論是「只有充分掌握某種不完美的生存美學，並且學會安居於流放之中，離散親密關係才可能成立。離散親密關係是對於母國深情的告別。它帶著口音——在異國語與母語兩種語言之中皆然」。²³ 柏音的親密離散理論是以歐美歷史經驗為基礎，結合了由城市現代性與當代族裔離散所催化出來的特殊情感結構，試圖表達一種帶有「口音」（accent）的生存態度，強調的是去國離鄉的移民如何在充滿失落感的日常生活環境中，表達懷鄉情思以及覓得苦澀的親密之感。相對而言，眷村書寫則是植基於當代中國與台灣特有的歷史脈絡，雖然與城市現代性的關係不大，但仍然充滿了離鄉

21 筆者個人的記憶中眷村也從來不乏村外小販身影，販賣醬菜或雜貨。趙慶華在另一篇短文〈鄉愁與離散——「眷村文學」在台灣〉中也提及一九八〇年代的台灣劇烈轉型，眷村住民因為社會變遷而走出竹籬笆，與村族群匯流，也重新思索自我認同的問題。即使是受到外在環境的牽動，仍然不能否認眷村之內外空間具有流動性。趙慶華，〈鄉愁與離散——「眷村文學」在台灣〉，張嬭主編，《寶島眷村》（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01），頁115-116。

22 Svetlana Boym, "On Diasporic Intimacy: Ilya Kabako's Installations and Immigrant Homes," *Critical Inquiry* 24 (Winter 1998), p.501.

23 同註22，p.524。

背井的愁思與落地生根的欲望之間的張力，也在不同文化與生活型態的迂迴折衝之間建構出帶有濃厚口音的離散親密關係。²⁴

筆者以為蘇偉貞的眷村書寫充滿了這種在地化的離散親密關係，也特別重視由感官知覺所傳達的情感層次。就感官理論而言，史圖亞特（Susan Stewart）在解釋感官知覺與記憶之間的關係時指出，馬克斯（Karl Marx）認為五官感知不只是用以回應、了解世界的器官，「感知也是物質記憶強而有力的來源。這些記憶具有物質性，因為是經由肉身傳載——也就是說，它們是儲存於我們肉體經驗的意識之中，如果受到壓抑時就存在無意識的知識之中。因為感知經驗代代存留與傳衍，它們在藝術作品中發聲的特殊形式，就能提供我們這些經驗之改變以及遭到轉換的歷史敘述」。²⁵ 史圖亞特也認為藝術與感知之間的關聯在於「我們經常以感知做為主題（thematic）」，²⁶ 例如在分析法國作家普魯斯特（Proust）的文本中的感知經驗時，我們知道藝術可以引領我們了解「感知經驗的跨主體層面（the intersubjective aspects of sense experience）」。²⁷ 人類學家費爾德（Steven Feld）也提出「環境感官認識論」（a sensuous epistemology of environments）的說法來解釋感知與地域空間的關係。他以新幾內亞一個部落在聲音感知方面的田野調查，說明感知與地方之間雙重的互動（doubly reciprocal motion）：「當我們以感知去了解一個地方，感知也具有了地域性；地方創造出感知，感知也創造出地方（as place is sensed, senses are placed; as places make sense, senses make place）」。²⁸ 史圖亞特的論點提醒我們重視感官、記憶與藝術創作之間的互動關係，而費爾德的說法也可以用來詮釋蘇偉貞筆下眷村居民的感知與眷村地域空間之間的緊密連結。以下筆者試圖從聽覺感知與嗅覺感知分別探討《有緣千里》與《離開同

24 其實城市經驗在眷村書寫中往往是相對於眷村生活的對照，甚至是眷村繼續存留的外在威脅。

25 Susan Stewart, "Remembering the Senses," David Howes, ed. *Empire of the Senses: The Sensual Cultural Reader* (Oxford: Berg, 2005), p.59.

26 同註25, p.64。

27 同註25, p.67。

28 Steven Feld, "Place Senses, Sense Placed: Toward a Sensuous Epistemology of Environments," David Howes, ed. *Empire of the Senses: The Sensual Cultural Reader*, p.179.

方》之中感官書寫的運作。在本文中之所以選擇討論這兩部小說，是因為《有緣千里》與《離開同方》是目前蘇偉貞的文本中最直接以眷村為主題的長篇小說。

三、《有緣千里》與《離開同方》中的感官書寫

齊邦媛指出：「眷村文學重要的主題大約盡在聚、散二字」。²⁹筆者以為《有緣千里》與《離開同方》可謂蘇偉貞筆下最著意探索眷村經驗中聚散依依之感官情懷的作品。以聽覺感知來詮釋《有緣千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蘇偉貞是如何建構出離散的親密關係。海浪是《有緣千里》中聽覺敘事的重要符號，為小說建構出特殊的「環境感知」。³⁰小說敘述的是屏東東港致遠新村兩代的生命故事，一起始的敘事符碼即與聽覺有關：

仲夏。

最晚兩個乘涼者搬凳子進屋後，僅有的續斷聲餘休止下去。

.....

四處蟲鳴，夏夜蛙叫驚人，海浪遠聲唱和，夢鄉沉浮其上，自有一番異國情調.....³¹

在這個充滿感官知覺的小說開場中，人聲與自然聲響交互出現，不但為時間（仲夏）定位，也牽引出海島濱海的空間性以及去國離鄉之感。

而村民們的親密關係也建立在聽覺聲響的基礎上。有時是夫妻之間的夜半私語，例如蘇偉貞以「猶如玉盤落珠，斷續清越，高抑低盪，曳然中止處也毫無尷尬」形容高奧與妻子敬莊的夜話家常（《有緣千里》，頁4）。有時則是因為眷村稠密的空間配置造成雞犬之聲相聞，使得家人之間的互動超越私密空

29 齊邦媛，〈眷村文學——鄉愁的繼承與捨棄〉，《霧漸漸散的時候》，頁156。

30 趙慶華的論文也提及海浪的意象如何從陌生環境的象徵轉變為東港孩子故鄉的代表。同註14，〈相聚、離開、沉默、流浪——閱讀蘇偉貞的「眷村四部曲」〉，頁152-153。

31 蘇偉貞，《有緣千里》（台北：洪範書店，1984.11），頁1。後續引文出自此書者，直接於內文中標記書名及頁數。

間，需要鄰居／軍階介入仲裁，例如敬莊深夜聽見秦世安怒斥寶珠——「那點變化破寧靜而來，在黑夜下，尤其不協調，竟是爭吵聲」（《有緣千里》，頁5）——而要求高奧以空軍長官身分制止秦家可能發生的家暴。小說中秦世安與寶珠的爭執因為高奧夫妻介入由私領域轉變為公共事物之後加入了四川腔與台灣調，使得整本小說的聲頻變得異質多音，使得小說的聲音敘事變得眾聲喧嘩，突顯出眷村成員來源的異質性。有時聲音也標記出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異化，例如毛頭在海邊溺斃時母親的嚎哭：「哀嚎成了求懇，全無意義的單音，用銅線繫住，份外刮耳又繞人心弦。曾太太幾成半昏迷狀態，不解事的浪聲一波又一波，若無其事」（《有緣千里》，頁16）。此處以銅線的物化方式形容人哭聲的刺耳以及擬人化的方式形容自然界的魯鈍，使得人類與自然界交換錯位，道出人類與自然界雖有某種關係性的連結，卻終就無法互通心意；而此處巧喻（conceit）的使用也可以看出作者在小說中在處理聲音知覺時的細緻與用心。

《有緣千里》中另一個建構聽覺認知的重要符號是管堂而的樂聲與歌聲。第三人稱的敘事者告訴讀者在光陰的故事中不變的是管堂而的歌聲，「日日年年越唱越熾，終於唱熱半片紅天……致遠新村發生了任何事情，回想起時，全有歌聲襯底」（《有緣千里》，頁115），包括「本省」與「外省」小孩的群架，樂增學摔機身亡，管堂而追求樂之遺孀重組家庭等等情節。管堂而發抒內心情感的歌聲因此成為離散族群生活中的恆定元素，也不折不扣成了致遠新村悲歡離合故事的配樂聲帶（soundtrack）。

小說中來自蒙古草原東胡別族的管堂而是以激烈的吉他演奏出場，蘇偉貞也用了戲劇化又文學性的詞彙形容管的樂聲——「絲弦昂揚，繃然欲斷，把喧鬧聲沉澱於底」（《有緣千里》，頁49）。管堂而充滿才情，歌聲「寬闊嘹亮」，卻被主修聲樂的妻子蒙期采認為是「不學無術型歌聲」（《有緣千里》，頁50）。小說中以女聲拒絕與男聲合唱表達兩人之間的不和：「比啼歡唱，不願共鳴，間隙有多寬？堅持能長久嗎？況且那兩道特殊的音域，無以溶合、也容不進別的調。都太自我了」（《有緣千里》，頁89）。小說以預示性的書寫方式讓閱讀小說的「聽眾」意識到管蒙分道揚鑣難以避免，而小說中的

聽眾趙致潛也因此意識到她與台南望族之子的婚姻前途茫茫。管、蒙夫妻二人難以和諧的聲音，突顯出小說在音樂聽覺的部分產生了某種分歧，也呼應了門第／學院歧見對於族群融合所造成的阻力。

趙慶華在論文中也認為管堂而的歌聲是村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相聚、離開、沉默、流浪〉，頁155），但是質疑小說中對於歌聲有重男輕女的性別化處理，貶低了蒙期采之歌聲，因為蒙逾越了眷村「父權之境」的性別限制，屬於眷村的異類（〈相聚、離開、沉默、流浪〉，頁156）。然而筆者認為除了性別化的解讀之外，管堂而與蒙期采的歌聲在小說中意義不同，雖然兩者皆為抒發自己而歌，管堂而的歌聲是公共之聲；而蒙期采的歌聲是為了追求個人成就，有著功利主義商業化的色彩。同時，蒙期采追求歌唱事業帶著沉溺於舊中國榮光與階級身分的成分，這一點可以從她的名字「期采」——期待精采的人生——得到一些線索，也可以從她由致遠新村出走時身著來自繁華都會上海的「銀白薄翼紗旗袍，鑲銀貓眼綠耳環」一身華貴打扮得到印證（《有緣千里》，頁95），而她堅持完成做聲樂家的美夢也是為了對得起她「杭州音專的學歷」（《有緣千里》，頁50）。如果從眷村的認同意識而言，管堂而一直留在致遠新村，而蒙期采則選擇離開村落，接受城市的召喚，尋找她所需要的聽眾與環境——「光線充足而聚音差勁的地方住一個聲樂家，只暴露了環境的不足」（《有緣千里》，頁93）。³² 這對緣淺的夫妻的離異因此象徵式地代表了去留眷村的兩種不同抉擇。

《有緣千里》後段眷村第二代的角色幾乎都離開致遠新村而移居城市，結尾時引領他們回鄉的也正是海浪聲與管堂而的歌聲，讓他們頓悟「原來台北市沒有浪聲才不對勁」，而管堂而的「樂器歌聲代表了一切歡天喜地」（《有緣千里》，頁252）。這本以寫實主義為基調的小說以聲音感知開始，也以不變的聲音感知結束，首尾呼應，見證了眷村人民在離散的情境中與新的人事地物建立了親緣與血緣，道出「什麼都變了，什麼都沒變」（《有緣千里》，頁

32 齊邦媛則指出蒙期采生不逢時，「女子追求家庭以外的理想所付出代價，在那個時代何其之高」。《霧漸漸散的時候》，頁158。

253) 的真理。

《離開同方》是透過奉磊這個第一人稱的敘事者，講述在南部某么么拐高地的同方新村之中發生的愛恨情仇。相較於《有緣千里》中突出的聲覺敘事，聲覺在《離開同方》仍然代表著某種眷村的屬性，因此小說一開頭就記述奉母在晚年如何將家裡「一切會響的設備全都打開來弄出聲音，好像她仍活在熱鬧的同方新村」。³³ 奉母對於聲音的執著，說明了她在離開同方新村之後，對於昔日眷村雞犬之聲相聞以及眾聲喧嘩的懷舊。³⁴ 因此筆者同意趙慶華的論點，同方新村的眷村特性並未因為大量的情愛故事而被沖淡，而且蘇偉貞也在小說中設計了「同方新村專屬的標記」——「雨和花，尤其是玉蘭花」（〈相聚、離開、沉默、流浪〉，頁166）。同時，筆者也認為玉蘭花以及小說中其他與嗅覺相關的元素在《離開同方》複雜的魔幻敘事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離開同方》的諸多書評都指出這本小說受到魔幻寫實的影響。張大春稱之為「拉丁美洲魔幻寫實主義為台灣眷村故事所織染的驚奇氣氛」，使得小說中奉磊的敘事觀點可以自由進入眾多角色之內心而仍具說服力。³⁵ 陳義芝則稱讚在《離開同方》之中「蘇偉貞打破了真實與虛構的界分，創造出一種原始神祕的真實。那種真實非一般俗表之真實，既帶著荒謬、誇張的詭祕性，又深挖到靈魂血處，令人不敢逼視」。³⁶ 魔幻寫實的書寫技巧是在寫實的基礎上進行超寫實式的發展，而《離開同方》中各種日常生活的元素確實得到淋漓盡致的

33 蘇偉貞，《離開同方》（台北：聯經出版社，2002.05），頁1。後續引文出自此書者，直接於內文中標記書名及頁數。

34 李有成將《離開同方》比喻為「《台北人》的替代性論述」，而蘇偉貞有如班雅明的述史者（chronicler）或說故事者（storyteller），將同方新村的一切不分階級、鉅細靡遺地記載下來（〈眷村的童騷時代〉，頁12）。筆者以為這樣「民主式」（democratic）書寫的精神，倒不是出自一種烏托邦的想像，而是一種追憶逝水年華式的懷舊與珍惜。李有成，〈眷村的童騷時代〉，收錄於蘇偉貞，《離開同方》，頁11-13。

35 張大春，〈曖昧、纏綿的眷村傳奇〉，收錄於蘇偉貞《離開同方》，頁10。

36 陳義芝，〈悲憫撼人，為一個時代作結〉，蘇偉貞，《離開同方》，頁4。張頌聖也認為蘇偉貞在《離開同方》裡並非亦步亦趨地使用魔幻寫實，成績可觀。張誦聖，〈評蘇偉貞〈倒影小維〉，兼及前作《沉默之島》〉，《中外文學》25卷11期（1997.04），頁43-48。

奇幻發展，在本文中要特別針對屬於基本感官知覺的嗅覺做一分析。³⁷

蘇偉貞在《離開同方》中相當細心地經營嗅覺敘事的脈絡，諸多角色都有自己的代表氣味，也各自牽引出小說的不同情節。袁忍中／袁伯伯渾身酒味，「好像女人擦慣了的某種牌子花露水，變成了他的標誌」（《離開同方》，頁25）。因為輩分差異而陷入苦戀被母親軟禁的方景心／方姊姊為了抗議，赤身裸體卻擦上濃濃的茉莉花香水，最後香水味變成她逃家私奔的掩護，因為大家誤以為「祇要那香味存留便表示方姊姊在家沒跑出去」（《離開同方》，頁135）。方景心在寄給小余叔叔／余蓬的情書裡卻散發著桂花香，令敘事者不禁感嘆：「方姊姊在他處所散發的香味居然和在家裡完全不同，彷彿她在外人與家人面前有完全不同的面貌」（《離開同方》，頁145）。席阿姨／席宜芳與丈夫段錦成／段叔叔，以及鄰居小佟先生／佟傑之間的三角關係也可約化為氣味的戰爭。席阿姨把小佟的美國「旁氏」面霜收在家中衣櫃，暗暗幽香「統治」全家，也引發家狗、野狗齊吠，「追著異香飄忽的起伏吠聲忽高忽低」，反而是「對氣味向來不會很快適應」的段叔叔賭氣置之不理，「因為被一陣看不見的香味打敗他覺得不值得」（《離開同方》，頁262）。嗅覺因此成為情慾／家庭權力競爭的場域。最後段叔叔決定退讓，送席阿姨去見病危的小佟時，敘事者告訴我們小佟的體味也等同於麻醉藥味（《離開同方》，頁274），三人的戰爭最終封存在消毒藥水及麻醉藥的味道之中。就連同方新村都有自己的氣息：來村裡尋找翹課學生的實習老師在家訪未果之後，「一路往學校走去玉蘭花香味罩頭罩腦灌下，這村子真是香得詭異」（《離開同方》，頁142）。顯然蘇偉貞在小說中賦予各種天然、人造的氣味濃厚的象徵意義，有意挑戰讀者的嗅覺想像。

筆者以為小說中最具魔幻寫實色彩的嗅覺敘事是與甘蔗有關的系列，不但以台灣早期最具代表性的農業經濟作物做為在地性的標誌，也帶出小說中最

37 雖然齊邦媛不認為《離開同方》中魔幻寫實的部分情節可令人全然信服，但也注意到小說中特別的感官式書寫，認為在《離開同方》中蘇偉貞試圖脫離《有緣千里》的寫實手法，「以純藝術方式再塑眷村群像」尋求突破，「大量使用聲、色、光、影來陪襯事物，在後段尤其加強使用自然的神祕力量，如雨、花香和貫穿全書的毀滅性的火」。《霧漸漸散的時候》，頁178。

奇幻難解的復活情節。甘蔗氣味首次登場是用以描寫「現在式」的同方新村：「昏黃的天地裡混合了甜甘蔗的味道，高速公路經過的車輛形成的音爆彷彿一顆不定時炸彈，將草的清香、甘蔗的甜膩爆了開來」（《離開同方》，頁7）。代表現代行動力的車輛與高速公路宛如暴力分子，侵入了自然的領域，以象徵性暴力的形式刺激嗅覺，也牽引出火燒甘蔗園這一段實質暴力的往事。事實上，小說的敘事者奉磊之前就論及么么拐高地被高速公路一分為二之後已經人事全非：「失去腹地的同方新村不再是以往生命力旺盛而備受詛咒的同方新村」（《離開同方》，頁4）。雖然讀者不甚清楚同方新村為何受到詛咒，但是奉磊童年時的同方新村彷彿屬於魔法猶存的「前現代」奇幻世界，是個農業時期的台灣，與自然界緊密結合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甘蔗與青草即是農業時代自然世界的表徵。

下一段甘蔗甜香的氣味是出現在同方新村的晚餐時分，緊緊扣合了村人的日常生活習慣：

別人家的炒菜味兒飄了過來，我們這兩排房子戶戶背靠背，中間一條穿巷，擴音機似的，誰家吃什麼我們清楚的很，炒菜力道傳得老遠，魔術棒一樣點的大家菜色一致。就看吃飯時，我們端碗白飯到誰家夾幾筷子菜就像自家盛好出去的一樣。就二號雲南人袁伯伯人辣菜也炒得辣，他說去潮溼。（《離開同方》，頁12）

晚餐時分的同方新村展現典型眷村一家親的情境，不同灶卻有如家人共同開伙，來自異域的刺激性飲食習慣，也因為可以對治在地氣候的缺陷有了存在的理由與依據。此處蘇偉貞同時透過嗅覺、聽覺與味覺鮮活地呈現眷村的風土人情與生活情狀。

然而這慣常的生活律動也隨即因為異常的味道遭到打斷：「這會兒的空氣像摻了糖，這甜味越來越濃，掩蓋了家家戶戶的青菜蘿蔔味，最後燒焦了變得有些苦，我們村上也沒誰捨得摺下那麼多糖在菜裡」（《離開同方》，頁12）。陌生的焦糖味一方面道出早期眷村物資缺乏的光景，一方面則連接到前

一段眷村孩童在蔗園裡迷路玩火的情節。延燒了一整天的大火帶來甘蔗「灼燒的聲響」和「焦糖發出的澱粉味」也成為奉磊終生惡夢的來源，讓他在夢中一直是個遭到咒詛無法長大的小學生，在濃煙中迷路，「大量的夢境以及濃煙，每一回我在夢境中嗆咳不已醒來」（《離開同方》，頁17）。夢境中無法長大的恐懼以及強烈的生理反應顯示這場大火是奉磊成長過程中的一大創傷，而創傷的來源除了意外災難帶來的驚嚇，還有甘蔗園裡的兩具焦屍。村人認定這一對橫死的男女就是方姊姊與小余叔叔，兩屍三命，導致方母傷心過度癱瘓在床。雖然甘蔗園大火的原因始終不明，然而在奉磊心中應該已經認定是同伴玩火的惡作劇闖出大禍，再加上奉磊陪伴方姊姊夜訪小余叔叔，造成方的二次懷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或許都成為奉磊成長過程中創傷的來源。

小說中最難以解釋的神秘事件，是數年之後方余二人在玉蘭花的香味中再度出現。玉蘭花香原來就是同方新村的嗅覺表徵，此時更是異常芳香，「香味香得散不開，像香水本身不像花朵傳出去」（《離開同方》，頁286），經由奉家阿跳四處插枝的玉蘭花一夜之間在村中全部盛開。奇異的香味與過於旺盛的生命力引導出奇幻的邏輯，被認為早已殉情的戀人也在黃昏時分突然出現：「就當我們那兩排香水味全集中到方家院子那棵千祥雲集般的玉蘭花樹上空，方家門口出現了一對灰濛濛徘徊的人影，那愈來愈濃可疑的香味彷彿被他們帶來。那兩個人也像一股味道無聲無息」（《離開同方》，頁287）。用「無聲無息」形容氣味本來就是一種巧喻，用味道形容疑似還魂的情侶則更加深詭譎志異之感。雖然事實證明方姊姊和小余叔叔是人非鬼，然而方家破碎的親情卻無法重圓。對於遭到老父拒絕的方姊姊，玉蘭花「濃得彷彿腐敗了般」的香味召喚出當年苦等余蓬的心情（《離開同方》，頁294），這對最早離開同方的夫妻也在花香中再度離去，有如夢境一般「當著大家面前活生生一步步消失」（《離開同方》，頁296）。雖然同方新村的故事並未在此結束，而是緊接著以另一場與火相關的悲劇終結小說中諸多情慾的糾結，透過對於嗅覺的分析，讀者仍然可見蘇偉貞在《離開同方》中是如何結合感官知覺與魔幻寫實手法呈

現特殊而動人的感官書寫，以幽微纖細的情感描寫時代洪流之下造成的離散聚落，建構出蘇式自己特有的眷村敘事。

正如前言，眷村是在二十世紀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下的產物。蘇偉貞曾說過：「如果我們能理解薩義德，就能理解『眷村性』」。³⁸對於蘇偉貞而言，顯然「眷村性」與鄉關何處的惆悵感是緊緊相連。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當台灣各地的眷村多數已經拆除、改建之後，這個台灣當代經驗中特殊的一環也瀕臨消失的命運，而眷村文學正是試圖捕捉、再現這種消逝中的離散情感結構。扶桑花、玉蘭花、七里香都是形構這情感結構諸多元素之一。然而，在感嘆眷村的消逝之際，若是我們能夠拆除思想與情感上的圍籬，擴大眷村的定義，並且意識到曾經在眷村生活過的人們並沒有失去眷村的記憶，而是走入更廣大的空間，創造更具開放性的血緣與親緣關係，則眷村的情感結構會因此更加複雜而豐富。誠如齊邦媛所言，「台灣本是一個移民的世界。安平、鹿港、淡水、艋舺……當年都是族群聚居，互相保護、掩埋彼岸往事的眷村。由此延伸，全世界的中國城何嘗不是眷村？世界版圖上的地名國名建立之初與台灣的眷村何異？」。³⁹因此，在筆者心中，即使出生的眷村成了台北市的商業精華地區，或是外婆家已經成了國中的操場，我永遠擁有的是七里香的記憶，陪伴著我在不同的「眷村」中行走。



38 蘇偉貞，〈序：拒絕遺忘〉，張嬭主編，《寶島眷村》，頁10。

39 齊邦媛，〈得獎「者」張啟疆——看不見的眷村〉，張啟疆，《張啟疆的眷村小說／消失的□□》（台北：九歌出版社，1996.11），頁10。

參考資料

一、專書

張啟疆，《張啟疆的眷村小說／消失的口口》（台北：九歌出版社，1996.11）。

張翰璧主編，《扶桑花與家園想像》（台北：群學出版社，2011.08）。

張嬭主編，《寶島眷村》（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01）。

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台灣小說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10）。

楊放採訪整理，《落地生根——眷村人物與經驗》（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6.04）。

齊邦媛，《霧漸漸散的時候》（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10）。

齊邦媛、王德威主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03）。

蘇偉貞，《有緣千里》（台北：洪範書店，1984.11）。

——，《租書店的女兒》（台北：印刻出版社，2010.04）。

——，《離開同方》。1990（台北：聯經出版社，2002.05）。

——主編，《台灣眷村小說選》（台北：二魚文化出版社，2004.02）。

Howes, David, ed. *Empire of the Senses: The Sensual Culture Reader*. (Oxford: Berg, 2005.)

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P, 1977.)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張誦聖，〈評蘇偉貞〈倒影小維〉，兼及前作《沉默之島》〉，《中外文學》25卷11期（1997.04），頁43-48。

趙慶華，〈相聚、離開、沉默、流浪——閱讀蘇偉貞的「眷村四部曲」〉，《台灣文學研究》1卷1期（2007.04），頁143-187。

劉俊，〈從《有緣千里》到《離開同方》——論蘇偉貞的眷村小說〉，《暨南學報》29卷4期（2007.07），頁82-87。

Boym, Svetlana. "On Diasporic Intimacy: Ilya Kabakov's Installations and Immigrant

Homes.” *Critical Inquiry* 24(Winter 1998), pp.498-524.

Foucault, Michel.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1986), pp.22-27.

（二）學位論文

柯雅文（Sabrina Corius），〈眷村文學之認同困境與鄉愁意識——以蘇偉貞與張啟疆作品為主〉（台中：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